

刘知几在古文献学上的成就

孙 钦 善

刘知几的《史通》，不仅是一部史论名著，其中也有不少有关古文献学的内容，反映了刘知几在古文献学上的成就，值得加以总结。

从《史通》看，刘知几在古文献学上的成就主要有三方面：

一、冲破儒家传统观念，开“六经皆史”论之先河。

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、独尊儒术以后，儒家经书被抬到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，影响了对它们实事求是的研究和整理。刘知几则把经书作史书或史料看待，这在汉以来的古文献学史上，堪称思想之一大解放。例如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本皆属经传，却被刘知几作为史书来看待、来研究。他认为《尚书》是记言之史，说：“《书》之所主，本于号令，所以宣王道之正义，发话言于臣下，故其所载皆典、谟、训、诰、誓、命之文。至如《尧》、《舜》二典直序人事，《禹贡》一篇唯言地理，《洪范》总述灾祥，《顾命》都陈丧礼，兹亦为例不纯者也”，“原夫《尚书》之所记也，若君臣相对，词旨可称，则一时之言，累篇咸载”（《史通·六家》）。他认为《春秋》为记事之史，孔子作《春秋》，是述鲁史以寓褒贬，如说：“逮仲尼之修

《春秋》也，乃观周礼之旧法，遵鲁史之遗文，据人事，仍人道，就败以明罚，因兴以立功，假日月而定历数，藉朝聘而正礼乐，微婉其说，志晦其文，为不刊之言，著将来之法。”（《六家》）他认为《左传》是以事释《春秋》之作：“观《左传》之释经也，言见经文而事详传内，或传无而经有，或经缺而传存，其言简而要，其事详而博，信圣人之羽翮，而述者之冠冕也。”

（《六家》）这里虽以经称《春秋》，但只是袭用旧名而已。他认为《春秋》尽管称为经，《左传》尽管称为传，其实质皆为史。他还认为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礼》亦属史籍，如《自叙》说：“昔仲尼以睿圣明哲，天纵多能，睹史籍之繁文，惧览者之不一，删《诗》为三百篇，约史记以修《春秋》，赞《易》道以黜八索，述《职方》以除九丘，讨论坟、典，断自唐、虞，以迄于周”，即把孔子所整理的经书统统归为“史籍”。这种观点在当时新人耳目，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影响。

二、归纳义例，综考源流，对史部目录学有所创通。

《史通》着重讲论史书义例、源流、撰法，不仅对史书编撰有指导意义，从文献学方面看，对史部目录学亦有贡献。

首先，在史部分类上有所贡献。关于史书之分类，《史通》从体裁上归纳为“六家”、“二体”。六家中，《尚书》家指记言体，《春秋》家指记事体，《左传》家指编年体，《国语》家指国别体，《史记》家指通代纪传体，《汉书》家指断代纪传体。二体专指编年和纪传，它们是千古流传的两种史书体例。《六家》说：“于是考兹六家，商榷千载，盖史之流品，亦穷之于此矣。”《二体》说：“既而丘明传《春秋》，子长著《史记》，载笔之体，于斯备矣。后来继作，相与因循，假有改张，变其名目，区域有限，孰能逾此！”纪传类在《史通》之前的《隋书·

《经籍志》及《史通》之后的史部目录中称为“正史”。而《史通》有《古今正史》一篇，其所谓“正史”与“偏记小说”相对而言，不专指纪传，编年亦包括在内。相较而言，以《史通》名目为确切。编年类则为《史通》独创，为其后目录所袭。

正史之外，有所谓偏记小说，《杂述》说：“是知偏记小说，自成一家，而能与正史参行，其所由来尚矣。爰及近古，斯道渐烦。史氏流别，殊途并骛。樞而为论，其流有十焉：一曰偏纪，二曰小录，三曰逸事，四曰琐言，五曰群书，六曰家史，七曰别传，八曰杂记，九曰地理书，十曰都邑簿。”这些类目亦与其前后目录有同有异，不乏独创。

关于史注之分类，《史通》归纳为训诂解释和广异补缺二体，实属古今通例。如《补注》说：“昔《诗》、《书》既成，而毛、郑立传。传之时义，以训诂为主，亦犹《春秋》之传，配经而行也。降及中古，始名传曰注。盖传者转也，转授于无穷；注者流也，流通而靡绝。进此二名，其归一揆。如韩、戴、服、郑，钻研六经，裴、李、应、晋，训解三史。开导后学，发明先义，古今传授，是曰儒宗”，此即为训诂解释一体。广异补缺又分两类，一为他人所注，一为作者自注，如《补注》说：“次有好事之子，思广异闻，而才知力微，不能自达，庶凭驥尾，千里绝群，遂乃掇众史之异辞，补前书之所缺。若裴松之《三国志》，陆澄、刘昭两《汉书》，刘彤《晋纪》，刘孝标《世说》之类是也。亦有躬为史臣，手自刊补，虽志存该博，而才缺伦叙，除烦则意有所吝，毕载则言有所妨，遂乃定彼榛槁，列为子注。若萧大圜《淮海乱离志》、羊銜之《洛阳伽兰记》，宋孝王《关东风俗传》，王劭《齐志》之类是也。”对于史注之二体，刘知几的归纳是科学的，但他崇训诂而薄补遗，这种评价未必恰当。

其次，《史通》论述史部文献，多综考源流，揭示内容，具

有叙录价值，相当于解题目录。特别是《古今正史》一篇，等于远古至刘知几生世的一部史书文献史。此篇不仅依次叙列众书，而且对每一种书的成书过程考述甚详。例如关于《汉书》的考述，系据《后汉书》、《班固集》及《隋书·经籍志》等材料写成，但较今传《后汉书·班固传》及《隋书·经籍志》所记均为翔实，并且叙及《汉书》的流传、注释及影响。又如《隋书》，特别是其中的十志，编撰情况比较复杂，《古今正史》所言甚明：“初，太宗以梁、陈及齐、周、隋氏并未有书，乃命学士分修。……始以贞观三年创造，至十八年方就，合为《五代纪传》，并目录凡二百五十二卷。书成，下于史阁。唯有十志，断为三十卷，寻拟续奏，未有其文。又诏左仆射于志宁、太史令李淳风、著作郎韦安仁、符玺郎李延寿同撰。其先撰史人，唯令狐德棻重预其事。太宗崩后，刊勒始成。其篇第虽编入《隋书》，其实别行，俗呼为《五代史志》。”由此可知《隋书》之志本非《隋书》所专用，实为梁、陈、齐、周、隋五代史志，所反映的是五代的情况。其他如后汉史、三国史、十八家晋史、十六国史等，著作、著者都比较繁复，此篇之综述十分详明。

复次，保存佚书线索。东汉、魏晋南北朝至唐，是我国史学的大发展时期，史书众多，作者辈出，古书四部分类中的史部由此得以确立。但各朝史书在此时期内也先后出现集中统一的代表作，遂使其他众书在唐代以后逐渐亡佚。《史通》保存了不少佚亡史书的材料，散见于各篇，尤以《杂述》、《史官建置》、《古今正史》、《杂说》等篇所记更为集中和系统。这些材料可以和其他现存有关诸史的载录互相印证，以窥众亡书之崖略。有的材料可补诸史之缺遗，如《古今正史》所记十六国史，有许多书不见诸史记载。有的材料可订诸史讹误，如《古今正史》说：“庐江何之元、沛国刘璠以所闻究其始末，合撰《梁典》三十篇”，而《陈书·何之元传》、《周书·刘璠传》分别言各撰

《梁典》三十卷，《隋书·经籍志》、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亦著录为二人各撰，则为误分。又刘知几非常重视晋代汲冢发现的古史书籍，屡加引证。这些书后也佚亡，可借《史通》窥其眉目。

三、嫉妄崇实，重视考证辨伪

刘知几强调修史要实录直书，采撰要考核征实，这样的史学观点必然导致他在文献学上重视辨伪。

《史通》所辨，以伪事、伪辞为主，亦涉及伪书。

辨伪事、伪辞，首先针对史书。他认为世多忌讳又好阿谀，史家往往适俗随时，言不由衷，致使史书中伪事、伪辞甚多。

《曲笔》说：“盖史之为用也，记功司过，彰善瘅恶，得失一朝，荣辱千载。苟违斯法，岂曰能官。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，不闻以曲词获罪。……欲求实录，不亦难乎？”他认为世尚怪诞，史家好异猎奇，多信小说寓言、祥瑞灾异，也使伪事、伪辞泛滥。《采撰》说：“（中世作者）其失之者，则有苟出异端，虚益新事。至如禹生启石，伊产空桑，海客乘槎以登汉，姮娥窃药以奔月，如斯踳驳，不可殚论，固难以汙南（史）、董（狐）之片简，雒班（固）、华（峤）之寸札。而嵇康《高士传》，好聚七国寓言，玄晏（皇甫谧）《帝王纪》，多采六经图讖，引书之误，其萌于此矣。”又说“晋世杂书，谅非一族，若《语林》、《世说》、《幽明录》、《搜神记》之徒，其所载或诙谐小辩，或神鬼怪物。其事非圣，扬雄所不观，其言乱神，宣尼所不语。皇朝新撰《晋史》，多采以为书。”《杂说中》说：“……又刘敬昇《异苑》称晋武库失火，汉高祖斩蛇剑穿屋而飞，其言不经。致梁武帝令殷芸编诸《小说》，及萧方等撰《三十国史》，乃刊为正言。……编简一定，胶漆不移。故令俗之学者，说鳧履登朝，则云《汉书》旧记，谈蛇剑穿屋，必曰晋典明文。遮彼虚

词，成兹实录。语曰：‘三人成市虎。’斯言之得之者乎！”他还认为虚誉、传闻、附会之辞不可轻信。《采撰》说：“夫郡国之记，谱牒之书，务欲矜其州里，夸其氏族，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，明其真伪者乎？”“又讹言难信，传闻多失。……夫同说一事，而分为两家，盖言之者彼此有殊，故书之者是非无定。况古今路阻，视听壤隔，而谈者或以前为后，或以有为无，泾渭一乱，莫之能辨。”他提出：“异辞疑事，学者宜善思之！”甚至认为对史书中人物的言语风格亦须辨其真伪。《言语》是讨论这一问题的专篇。他认识到言语有时代、民族、地域的不同，提出了“时人出言，史官入记，虽有讨论润色，终不失其梗概”、“事皆不谬，言必近真”的原则。批评“后来作者，通无远识，记其当时口语，罕能从实而书，方复追效昔人，示其稽古。……用使周、秦言辞见于魏、晋之代，楚、汉应对行乎宋、齐之日，而伪修混沌，失彼天然，今古以之不纯，真伪由其相乱。”其他如《杂说》等也有类似的议论。或批评史书言语典雅，以失俗真；或批评“史之载言”受骈文影响，而失口语之实。

刘知几对史书记载致伪原因亦略有分析，《杂说下》说：“夫传闻失真、书事失实，盖事有不获已，人们不能免也。至于故为异说，以惑后来，则过之尤甚者矣。”这里指出了致伪有客观原因，亦有主观原因。他认为避免客观原因，关键在于重视考辨，提高见识。《暗惑》说：“盖精五经者，讨群儒之别义，练三史者，征诸子之异闻，加以探颐索隐，然后辨其纰缪。”而避免主观原因，则只有提高史德，既不“向声背实，舍真从伪，知而故为”（《杂说中》），又不畏惧邪恶，不敢直书，有所偏私，党同伐异。这种分析虽然针对史家修史而言，但对史书辨伪亦有参考意义。

《史通》中还有多处对经书伪事、伪辞进行了辨驳，尤其集中于《疑古》、《惑经》两篇。《疑古》一篇认为圣人由于偏私

隐讳照样会歪曲、抹杀史实，如说：“案《论语》曰：‘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。’又曰：‘成事不说，遂事不谏，既往不咎。’又曰：‘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。’夫圣人立教，其言若是，在于史籍，其义亦然。是以美者因其美而美之，虽有其恶，不加毁也；恶者因其恶而恶之，虽有其美，不加誉也。故孟子曰：

‘尧舜不胜其美，桀纣不胜其恶。’……而拘于礼法，限以师训，虽口不能言，而心知其不可者，盖亦多矣。又案鲁史之有《春秋》也，外为贤者，内为本国，事靡洪纤，动皆隐讳。斯乃周公之格言。然何必《春秋》，在于六经，亦皆如此。”《惑经》一篇专辨孔子删定的《春秋》。他认为孔子修《春秋》多有褒讳，又或凭传闻，或沿讹谬，或存缺略，以致“《春秋》之义，其所未谕者有十二。”刘氏还追根求源，指出虚美的根由在于儒家的偏私：“……徵其本源，良由达者相承，儒教传授，既欲神其事，故谈过其实。”

以上介绍的是考辨史书、经书中的伪事、伪辞的情况。《史通》中还有关于书籍本身真伪的考辨。对于伪《古文尚书》，刘知几像其他唐代学者一样，信而不疑，但对《舜典》及其孔传之伪造则有所辨，如《古今正史》说：“晋元帝时，豫章内史梅赜始以孔《传》奏上，而缺《舜典》一篇，乃取肃之《尧典》，从‘慎微’以下分为《舜典》以续之。自是欧阳、大小夏侯家等学，马融、郑玄、王肃诸注废，而《古文》孔《传》独行，列于学官，永为世范。齐建武中，吴兴人姚方兴采马、王之义以造孔传《舜典》，云于大航购得，诣阙以献。举朝集议，皆以为非。及江陵板荡，其文入北，中原学者得而异之，隋学（浦夹释：当作“博”）士刘炫遂取此一篇列诸本第。故今人所习《尚书·舜典》，元出于姚氏者焉。”此外还辨及他书，如《新唐书》本传说：“开元初，迁左散骑常侍。尝议《孝经》郑氏学非康成注，举十二条左证其谬，当以古文为正；《易》无子夏传；《老子》

无河上公注，请存王弼学。”亦有考辨单篇者，如《杂说下》说：“《李陵集》有《与苏武书》，词采壮丽，言句流靡。观其文体，不类西汉人，殆后来所为，假称陵作也。迁史缺而不载，良有以焉。编于李集中，斯为谬矣。”但辨伪书不是《史通》考辨的重点，故这方面的材料不多。

刘知几使用的辨伪方法也是多方面的，很有参考价值：第一，验之以事实，核之以道理。据事实，进行辨伪的例证很多，前面已经涉及，兹不赘述。强调据理考察亦不乏其例，《申左》说：“夫解难者以理为本，如理有所缺，欲令有识心伏，不亦难乎？”而且事理两方面往往是同时兼用的，例如《杂说上》辨《公羊传》说：“……如《公羊传》云：晋灵公使勇士杀赵盾，见其方食鱼飧。曰：‘子为晋国重卿而食鱼飧，是子之俭也，吾不忍杀子。’盖公羊生自齐邦，不详晋物，以东土所贱，谓西州亦然。遂目彼嘉饌，呼为菲食，著之实录，以为格言。非惟与《左氏》有乖，亦于物理全爽者矣。”刘知几认为《左传》记事属实，如与《左氏》有乖，即乖于事实。而物理即道理，与物理全爽，即与道理不合。可见事乖理爽便是他判断伪书的一个标准。第二，以可靠文献为准加以比较。刘知几在辨伪时，非常重视以可靠文献作为准的。例如他对西晋汲冢发现的古书非常看重，常常据以徵实辨伪。如《疑古》中据《汲冢琐语》“舜放尧于平阳”的记载，怀疑《尧典序》“将逊于位，让于虞舜”的说法，以为“斯则尧之授舜，其事难明，谓之让国，徒虚语耳。”这是对儒家禅让说的否定。第三，从成书背景、撰写宗旨上考察。如《申左》说：“故孔子曰：吾志在《春秋》，行在《孝经》。于是授《春秋》于丘明，授《孝经》于曾子。《史记》云：孔子西观周室，论史记旧闻，次《春秋》。七十子之徒口授其传旨，有刺讥褒讳之文，不可以书见也。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各异端，失其真意，故因孔氏史记，具论其语，成《左氏春秋》。夫学者

苟能征此二说以考三传，亦足以定是非、明真伪者矣。”这是说左丘明与孔子关系密切，《左传》为释《春秋》而作，非常可靠。而《公羊传》、《谷梁传》虽亦释《春秋》但其作者不了解孔子意图，不熟悉春秋史实，故不可靠。第四，考群书方法多样，如《新唐书》本传说他辨《孝经》郑注之伪，“举十二条左证其谬”；辨李陵《与苏武书》时，则明云根据语言和文体。

刘知几在古文献辨伪方面，直接受了王充的影响。他的《惑经》即上承王充《问孔》而作，如说：“昔王充设论，有《问孔》之篇，虽《论语》群言，多见指摘，而《春秋》杂义，曾未发明。是用广彼旧疑，增其新觉，将来学者，幸为详之。”其《暗惑》一篇又全仿《问孔》设论问难之文体。不仅如此，他强调对古文献作宏观考察而不拘泥于章句训诂的思想，也是受了王充的启示。王充曾说：“说《论》者皆知说文解语而已，不知《论语》本几何篇”（《论衡·正说篇》），“说章句者终不求解扣明，师师相传。初为章句者，非通览之人也”（《书解篇》）。刘知几也说：“古之人言《春秋》三传者多矣。战国之世，其事罕闻。当前汉专用《公羊》，宣皇已降，《谷梁》又立于学。至成帝世，刘歆始重《左氏》，而竟不列学官。大抵自古重两传而轻《左氏》者固非一家，美《左氏》而讥两传者亦非一族。互相攻击，各用朋党，哢聒纷竞，是非莫分。然则儒者之学，苟以专精为主，止于治章句、通训释，斯则可矣。於论大体，举宏纲，则言罕兼统，理无要害。故使今古疑滞莫得而申焉。”（《申左》）虽一就《论语》而发，一就《春秋》三传而发，但观点是完全一致的。刘知几的古文献辨伪思想，对后世也产生了积极影响，致使辨伪学经长期寂寞之后，自此又重新兴起。中唐时期辨伪的进一步开展，正是与刘知几的思想和实践一脉相承的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